

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

(美) 比尔德 (Beard, C. A.),

(美) 比尔德 (Beard, M. R.)

商务印书馆

下 卷

工 业 时 代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如果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制度固定不变,或者变化缓慢,没有给 3 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混乱,那么依靠不断地重复使用 1787 年、1820 年、1833 年和 1850 年的补偿策略,就可能无限期地保住力量均势,把固有的敌对情绪以这种办法限制在折冲 俎的范围内。但是,在美国经济或同它的多样性相关联的道德观念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固定不变的。

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生产制度的需要正在导致严重的后果。东北部工业化旋风的所及范围正在日益扩大,西北部的农业 4 也正在不断地得到制造业的补充,敞开让种植园主开发的处女地正在有规律地减少——上述情况微妙地改变着各种力量,使政治家们不得不努力地进行调整,以保持和平的均势。在这 3 个地区里,由于铁路、电报和报刊的发展,使旅行和通讯既便宜又迅捷,这样便把经济地位相似和有相同观点的人们带入了共同的活动 中,促进了向心过程,从而使社会一体化程度日益增强。最后,由于财富的积累和闲暇的增加而释放出来的智力——它又受到读者群和著作市场的扩大的刺激——越来越精确地促进形成了当时各种社会集团的语言模式,并卓有成效地促进了集团一体化的巩固。

1

随着岁月的流逝,杰斐逊农业集团的种植园主们仍然情绪激昂地坚持认为,反对党,即最初的辉格党,后来的共和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利益集团的联合,其组成的目的是掠夺生产管理权和在土地上劳动的劳工。他们坚定地宣称,他们的政治上的敌人贪得无厌,这是使国家在意见上四分五裂的根源。

“人类所从事的事业中(农业除外),”密西西比州的鲁本·戴维斯于1860年说,“没有一件不需要立法的帮助,使它能够扩大自己的利润,但所有的事业都以牺牲人类最主要的事业——农业为代价。……那些具有共同掠夺目的的利益集团已经联合起来,并共同把政府作为自己活动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因而实际上已使它变成了一个强权帝国。现在这群利益集团的联合体站到一起来反对各农业州,这就是像地震一样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政治组织的这场冲突的原因所在。”对奴隶制的愤怒,只不过是掩盖其他目的的一种托词而已。“无情的贪婪行为正以其铁蹄践踏宪法。”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已经把“农业各州锁在北方的山岩上”,并像一只秃鹫一样地生活在它们的繁荣之上。正是普罗米修斯挣断锁链的努力,激起了它对奴隶制的攻击。“这些州像巨人一样地斗争着,”戴维斯继续说道,“而且使那些联合起来的利益集团惶恐不安,生怕这些州可能挣脱为了掠夺而加在它们身上的锁链;正因为如此,这些利益集团就对南方各州的奴隶所有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自由土地的鼓吹者只对准州中的奴隶制开战,这一事实使杰斐逊·戴维斯断定其中隐藏着反对农业各州的阴谋。他对废奴主义者比对自由土地者表示了更多的尊敬。他说,前者是出于一种真诚的信念,认为任何地方的奴隶制都是邪恶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自由;后者并不攻击各州的奴隶制,只希望废除在适当时候将被允许参加联邦的各准州的奴隶制。

戴维斯挑战性地把矛头指向他在参议院中的对手,谴责他们利用奴隶制作为一种障眼物来欺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自由土地党的先生们,你们建议什么?你们是建议改善奴隶的条件吗?完全不是。那么你们又建议什么呢?你们说,你们反对扩大奴隶制……奴隶由此得到好处了吗?一点没有。你们现在向全国表明 6 的立场,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你们是想乘机欺骗我们说,你们要使奴隶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你们是想在美国国会内占据多数,以使政府变为北方扩张的一架机器;你们是想利用从南方以不公正手段得来的财富,发展自己地区的势力和繁荣,就像一个吸血鬼从自己的牺牲品中悄悄地吸血,直到自己脑满肠肥……你们是想削弱南方各州的政治权力;那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通过不公正的立法体系,以牺牲南方人民及其工业为代价,来发展新英格兰各州的工业。”

命中注定要做南部邦联总统的杰斐逊·戴维斯所担心的是,那个想在各准州中禁奴的党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党并不宣布奴隶制是一种道德上的弊端,从而要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重大治疗,它仅仅想使各个新州在其加入联邦时没有奴役制度——而它考虑的基本目的就是,在美国政府中获得支配地位,并使国家

牢牢地遵循这样一项经济政策，即为了北方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去剥削南方。

2

但是，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种植园主毕竟是反对人口统计表的。北方工业的惊人发展，铁路的迅速延伸，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到世界各地，西部农业地区通过运输和信贷而对制造业和金融业中心的依附，由于移民而使州意识遭到的破坏，外国侨民的入侵，民主党流域^①各新州的建立，州际商业中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北方人口的增加，资本主义冰川向南方的推进：所有这一切共同保证了论者所喜欢称为的“自由劳动制度”的最终胜利。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推进，它远比种植园主在有限的土地上的无力的劳工和肥力递减的土地进行的经营要更强大得多。那些能与时俱进的人们，欢呼机器工业胜利的即将来临，警告种植园主终将被征服。

在代表人口统计表中所记载的那些无敌力量的政治家看来，种植园主反对派是一个巨大的、紧密的和自觉的经济联合体，热衷于政治的目的——控制美国政府，反对不利的立法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统治各个准州，以及在整个国家实行全国逃亡奴隶法。北方政治家嘴上常挂着的莫过于“奴隶政权”这个词了。《国会环球报》的篇幅中，总是怒气冲冲地谈到“奴隶制度”及其对这个国家政府的影响。但是，只有纽约州的威廉·西沃德才以极熟悉的知识描

^① 指密西西比河流域，它是民主党的老巢。——译者

述过它，使得他的描述成为经典性的。

西沃德从经验中知道，政党不仅仅是讨论抽象事物的纯理论团体。“一个政党，”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合股公司，谁在其中贡献最多，谁就能指导它的行动和管理。蓄奴主对民主党的财力贡献最大，所以他们就必定要支配和规定它的政策。平时的党内核心会议制度，使他们能够以公平合理的外貌来做到这一点。”西沃德继续说，蓄奴主阶级只不过 34.7 万人，分布在特拉华河到格兰德河之间，它却占有着该地区几乎全部的不动产，拥有 300 万以上的其他“人民”，这些人没有一切公民权和政治权，禁止“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投票自由、教育自由、创作自由和群众集会自由。……蓄奴主阶级已经成为各蓄奴州的统治力量，并在实际上有权选择参议院 62 名议员中的 30 名、众议院 233 名议员中的 890 名，以及 295 名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中的 105 人”。

西沃德越谈越具体，他谴责现任总统是“一个公开为蓄奴主阶级辩护的人”。他考察了参议院的组成后，发现蓄奴主集团占据了所有的重要委员会。他仔细地察看了众议院，发现那儿并没有什么自由的可靠堡垒。他对披貂皮长袍的法官并不尊重，所以也不饶过最高法院。他讽刺地说道，“它开庭的公告，最适宜用这样的祈祷来作结尾：‘上帝拯救美国和这个正直的法院’。……这个法院有 1 名大法官和 8 名法官。这些人中有 5 名是从蓄奴州来的，4 名是从自由州来的。他们每个人的主张和倾向，在他们被任命时都经过总统和参议院的仔细审察。根据蓄奴主对宪法的解释，这些法官没有一人被发现在政治上缺少公正。那些从自由州来的，在这方面甚至比他们从南方蓄奴州来的弟兄还要突出。”

西沃德然后分析了全国政府的文官部门,在邮政部、财政部和其他大部雇用的数千人中,他没有发现一个人“不忠实于蓄奴主集团”。在分肥制度下,蓄奴主的统治遍及联邦政府的所有部门。“海关和公共土地局涌出两股金流——一股流入选举运动,保证蓄奴主阶级的选票;另一股流入国库,供那些将被认为适合的公职奖励的人们享受。”甚至在北方,宗教、教育和报刊也处于这一专横阶级的影响下,它们都战战兢兢地唯恐会引起它的愤怒。

在描述了蓄奴制这一巨大的运行机制之后,西沃德又花了相当的精力描绘了建立于“自由劳动”之上的那个对立制度。他考察了北方的经济发展过程——工业的发展,铁路的延伸,欧洲移民的滚滚洪流,以及自由农场主的西进浪潮——它使国家得到全面的发展,把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这些敌对的制度”继续保持更紧密的接触。然后他发出了使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保守公民为之一惊的预言:“制止不住的冲突”,后来证明这个预言最终成了事实。

他说,这场无情的冲突并非是“偶然的,不必要的,也并非自私或狂热的鼓动者所制造的结果,也不是一时性的”。不。“它是互相对立而又持久的力量之间一次制止不住的冲突。”有些人想呼吁奴隶主自己进行改革以谋求和平,这种希望就像暴风中的谷糠一样很快就消失了。“你们等待这种改革已经等了多久了,可又获得了什么成功?任何有产阶级自己进行过改革吗?古罗马的贵族、法国的贵族或僧侣进行过吗?爱尔兰的地主进行过吗?英国的土地贵族进行过吗?难道奴隶主阶级不是用这种希望在欺骗你们吗?难道它不是变得贪婪、傲慢、无视一切吗?”妥协的一切企图都

是“无结果的和一时性的”。因此，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一项至高无上的任务——“通过对背叛宪法和自由的人的一次决定性打击”，永远挫败和废除（奴隶制度）。这一预言很快就以惊人的准确性应验了。西沃德在进行了这些控诉后，又越出了谨慎小心的策略，向 1860 年有资格做共和党提名人的一小群人大声宣布了自己的主张。尽管他拼命用解释和补充来缓和他的话语，但却不能¹⁰使他的批评者感到宽慰。

3

如果对立双方的一些有资格的解释者都把制止不住的冲突视为明确无误的格局，那么这一争论就注定要从讲坛转到战场，从外交调解转到武力解决了。双方都冷酷无情地在谋划着，并争取人们相信它的正确。他们通过实现自己愿望的努力，加速了事情的变化，达到权力分配的目的，最后到了顶点，就发生了西沃德所预言过的那场悲剧。那些民主党人是按照历史知识而不是按照远见卓识来行事的，他们想起汉密尔顿的党首多次在选举中失败，回忆辉格党从未能使全国实行明确的韦伯斯特-克莱纲领，并且指望继续得到集结在种植园主后面的大量农场主和工匠的支持，因而明显地幻想政治（被认为是一种统计票数的科学）能够解决因维持联邦而产生的权力问题。

他们持着这样的看法，对 1852 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感到信心十足。在这次选举中，以墨西哥战争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为首的辉格党人，被新罕布什尔州来的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

击败。的确,人民的裁决是近于残酷的,因为皮尔斯除了4个州外赢得所有各州的拥护,得到了296张选举人票中的254张。把奴隶制说成是一种罪恶并要求在各准州中禁止它的自由土地党,只激起了一点点涟漪,在300万以上的选票中只得了15.6万张,这个数字低于上届大选的纪录。

由于辉格党遭到失败,自由土地党已显然缩小成为一小撮不足轻重的批评者,民主党人兴高采烈地控制了各个行政机构和国会,从而坚信他们的任期是有保证的。由于在限定关税收入和亲奴隶制的纲领上获得全胜,他们就一意孤行,仿佛汉密尔顿的党在一切实际问题上都已经像一小撮废奴鼓动者那样无能为力了。在随后的1856年大选中,他们又在全国获得胜利——这次是以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为他们的候选人。虽然他的胜利不如皮尔斯那样的有气势,但已足以使他们坚信,民主党的优势是不会在投票中散失的。

这8年的任期中,在民主党的主持下办了一系列的事情,从而确定了种植园主集团对全国的掌握,也相应地使反对派巩固了起来。这种方针一个方面的发展,表现在蓄奴地区的无限扩大;另一个方面的发展,表现在明确地推销政府对工业和商业企业的一切支持。这种新方针的第一个证据来自皮尔斯就职的当年。1854年,国会挑战性地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把路易斯安那购入地的大片地区向奴隶制开放,而这是三十多年前通过的这个契约所不允许的。奴隶制的拥护者们立即从密苏里拥入堪萨斯,决心使它进入南方的势力范围。那些好战的党派并不满足于征服西部禁区,他们在亲奴隶制的领袖率领之下,还企图攫取古巴和尼加拉瓜,美

国的3位公使在海外突然提出了惊人的宣言(即所谓的“奥斯坦德宣言”),宣称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用武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甚至使华盛顿的民主党政府感到不得不加以否决。

废除密苏里妥协案之后,最高法院又火上浇油地作出了两个决定,批准在美国扩大奴隶制,甚至保证在北方高度保护这种特殊¹²的制度。在1857年3月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中,大法官坦尼就宣称,密苏里妥协案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国会根据宪法无权在任何时候禁止美国领土内任何地方的奴隶制度。种植园主集团的这次司法胜利,又继之以1859年的另一决定,最高法院在这个决定中,维护了逃亡奴隶法及实施它的一切严厉程序。在惊恐万状的废奴主义者看来,只需要再采取一个步骤,就会使全国的解放奴隶运动成为违宪。

除了这些维护奴隶制的非常措施外,还有别的一些措施更加致命地影响了北方的经济利益。1859年,对大西洋航线各轮船公司的最后一次补贴,被国会命令取消了。1857年,再次削减了关税,清楚地表明了全国正趋向自由贸易。南部和西南部的议员们几乎一致支持这个行动,而且还使大批新英格兰各州的议员走进他们的营垒,其条件是不对棉织品的关税作实质性的削减。另一方面,中部和西部各州却有一个很大的多数派反对削减关税,因而使这种分野具有了征兆性。

新的岁入法实行后不久,全国就爆发了一次工业危机,使商人和自由劳工遭到了苦难。当这场风暴达到高潮时,民主党政府滥发的纸币达到了致命的顶点,各非法经营的银行所发出的票据,像

洪水一样地淹没了西部和南部,各地的金融机构都垮台了,印第安纳州仅在5年之中就倒闭了51家。从此以后,想复兴汉密尔顿财政体系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那些认为健全的通货是国家繁荣所必需的人,已经被赶到了绝望的边缘。在经济灾难达到顶峰时,布坎南总统又否决了宅地法,它是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农业派好不容易才使国会以一种妥协方式通过的。这项总统的独立行动,惹怒了农场主和工匠,因为这些人是把国家领土看成自家的继承物的。

4

在这一系列惊人的事件中,有两件事理应受到特别的注意,因为它们在这场斗争中的辩论术显得特别突出。这就是:废除密苏里妥协案和对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这两个西部的新准州的组织问题上,国会在1854年规定,当它们被允许参加联邦时,可以按它们各自宪法的规定,允许或不允许奴隶制存在。由于这些准州位于密苏里妥协线以北,所以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推翻了多年以来国家这两部分地区所遵守的庄严谅解。为了扫除一切怀疑,国会还明白地宣称,由于同不干涉准州中奴隶制度这一原则相抵触,1820年的密苏里契约已经无效。

这一纲领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民主党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而且据说他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他妄想当美国的总统。虽然道格拉斯承担了废除密苏里妥协的过失和荣耀,但密苏里州参议员艾奇逊却宣称是他自己引起这一行动的。

艾奇逊是当地奴隶主的代言人,急于冲进西部的富裕地区。美国政治的性质,使后一种观点似乎是可能的。

然而,这一点并不是重要的。这一场政治花招的重要特点,乃是国会对废除该案的表决情况。在参议院中,14 名南部民主党¹⁴人、9 名南部辉格党人和 14 名北部民主党人投票赞成这一法案;4 名北部民主党人、6 名北部辉格党人、2 名自由土地党人、1 名南部民主党人和 1 名南部辉格党人投票反对。简言之,在参议院中有 2 名南部的议员投票反对了这一措施。在众议院的 100 张反对票中,只有 9 张来自蓄奴各州,而有 42 名北部的民主党人从他们的党分裂出来,参加了执不同意见者的行列。从任何一方面来考虑,这种分野都是预示着不祥的,因为废除密苏里妥协案代表了差不多整个一贯支持民主党的南部各州的要求,它还得到北部民主党的一翼的支持——这给种植园主带来的胜利,仅仅次于卡尔霍恩的极端要求。诚然,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并没有绝对强迫即将被允许参加联邦的各州实行奴隶制,但却使各准州的奴隶制合法化,并允许它们的居民自己作出最后的抉择。

种植园主集团要赢得这个国家的全部准州领土,并明显地保证永远在权力均势中保持自己的力量,还必须在司法上采取另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它宣布国会无权按照宪法废除或禁止任何准州中的奴隶制。如果宪法能够如此解释,那么在国会能够取消这项法令的实施之前,就必须或者推翻这个决定,或者提出一项修正案。由于法官是终生职,而且新的任命必须由参议院批准,因此要使主管当局重谈议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另一方面,通过一项修正案,须经 3/4 的州批准,因而想用这

一方法来推翻决定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这种渴望已久的解释真地能够实现,种植园主的各州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至少那
15 一代的聪明人似乎是这样想的。然而在一切算计中都忽略了一点,这就是发生革命的可能性。

或者由于意外,或者出于有心,这个重大的争论问题在 1856 年以著名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件提交给最高法院。斯科特是一个奴隶,他被主人带到了路易斯安那准州北部,当时至少在理论上密苏里妥协案仍然有效,禁止在该地区实行奴隶制。这个奴隶在该地居住了一段时期之后,又回到了密苏里州,他在那儿请求得到自由,理由是他曾经去过自由的准州。那么他究竟是一个自由民还是一个奴隶呢?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简单。

最高法院本来可以三言两语地回答这一问题,无须提到密苏里妥协案或国会在美国各准州废除奴隶制的权力。法官们本来也可以完全轻松愉快地处理这一案件说:“不管斯科特在路易斯安纳北部地区时的身份如何,在他返回蓄奴地区时,就恢复了奴隶的身份,他现在是一个奴隶。”的确,当这件事情在进行第一次辩论时,多数法官都一致同意,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决定而不要涉及正在使全国激动的那个棘手问题。但是,在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后,多数人由于各种理由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最后,大法官坦尼发表了对处理这一案件并非必要的意见,他在这个意见中宣布,国会的法案(即密苏里妥协案)是完全无效的;国会不能合法地废除准州中的奴隶制。这样,他就给年轻的共和党一记猛击,因为该党的基本理论就是,国会应该在所有的准州中建立自由制度;显然,这位大法官忽视了所有各种各样的反奴隶制鼓动者。

南部的政治家们认为这一问题现在已经由终审当局的命令解决了,于是就号召他们的同乡人向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庭表示适当的尊敬,在当时情况下,这理所当然地是一种表示忠诚的劝告。但是,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共和党人拒绝了这一号召。在他们的影响下,北部的各立法机关谴责大法官坦尼的意见在性质上是超越宪法的,是纯粹的侵权行为,对人民没有约束力。民主党人曾有一次在大法官马歇尔正式批准后仍然反对成立美国银行的合法性,从而遭到了国会内外的一片嘲笑。共和党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援引杰斐逊很久以前在相似情况下对最高法院的攻击,当时这个法庭也曾自封对宪法冲突有最后的仲裁权。

亚伯拉罕·林肯深信这一决定是政治诡计,他说,即使共和党人愿意接受最高法院关于使斯科特返回奴隶身份的命令,他们也将坦率地拒绝它关于国会对奴隶制本身权力的意见。他详尽地阐释了这一思想说,总统和国会应该不把坦尼的意见视为法律裁决,奴隶制应该在准州中废除,不管最高法院所宣布的理论如何,这种意见应该通过和平的方法——它的意思当然就是通过有效的行使任命权而重建最高法院——来加以推翻。杰克逊的民主党曾经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也可以重新做到它。

林肯越想到德雷德·斯科特案件就越生气。最后他发出了战斗的调子:“对奴役的锁链熟视无睹,你们就准备自己的四肢带上它。习惯于践踏别人的权利,你们就会失掉自己独立的才能,变成从你们之中生长出来的头等狡猾的暴君的合格臣民。让我告诉你们,所有这些事情,历史已经为你们提供了教训,如果下几次大选 17 仍是如此,下一个德雷德·斯科特判决和所有未来的判决,都将被

人民默认。”

他党内的若干同僚越出了这个观点，公开谴责最高法院的这次行动，说它是由总统、若干国会议员和最高法院中亲奴隶制的一些法官共同安排的政治阴谋，目的是使各准州永远地固定在奴隶制上。他们仅仅根据一些偶然事件就作出了这个极端的论点。布坎南在 1857 年 3 月 4 日作就职演说时，恰好是最高法院公布对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意见前几天，布坎南的演说中提到即将作出的这一判决，而且表示他将同一切好公民一道，愉快地服从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样子”。对纽约州来的共和党领袖西沃德参议员来说，总统的这一声明纯粹是在愚弄人。他在参议院中作了厉害的指控，断言布坎南“贿赂美国最高法院或被它所收买”，勾结这个法庭，把奴隶制的磨石拴在堪萨斯人民的脖子上，而且当他和蔼地答应遵守最高法院的意愿时，他是非常了解它的裁决将意味着什么。

这一指摘自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这位参议员遭到保守方面的严厉批评。各方都谴责他没有丝毫证据地进行武断。的确，他的攻击看来也如此的轻率和不公，以致半个多世纪以后，甚至北方的历史学家也一致谴责它。例如，约翰·伯吉斯教授仔细地研究了 1899 年时可以得到的证据，在写到中期的发展时说，“布坎南先生和坦尼先生都是私人品格很高和为官名声极好的人，而且具有他们所担任的那些要职所需要的精密见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那个指摘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怀疑。”詹姆斯·福特·罗兹在所著历史书的第一版（后来作了修订）中甚至更强调地说：布坎南同白璧无瑕的坦尼勾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事情就这样拖下来,直到布坎南总统的文件在 1910 年公布时,才透露出部分真相。在这些文件中,有一张最高法院法官卡特伦的便条,日期是 1857 年 2 月 19 日,即总统就职演说前 13 天。在这张便条中,那位法官通知布坎南说,密苏里妥协线是否合乎宪法的问题,不久将由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中作出决定,并且要求当选总统写信给格里尔法官,陈述如何需要“最高法院的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肯定的决定,以平息国内的激动情绪”。按照这个建议,布坎南写信给格里尔法官;似乎由于这封信丢失了,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情况。布坎南显然在信中敦促法官们统一自己的意见;无论如何,格里尔在 1857 年 2 月 23 日(就职演说前 9 天)的回信中承认收到了布坎南的信,并简单叙述了德雷德·斯科特案的情况,讨论了最高法院即将作出的决定,说密苏里妥协线将被宣布为无效,而且这个意见将在 3 月 6 日提出。这位法官然后结束说:“虽然同我们通常的做法相反,我们认为理应由您直率而坚定地来陈述事态的真相。”因此,西沃德参议员的指控比他自己所想象的具有更充分的根据。

布坎南文件公布之后,一时之间仿佛德雷德·斯科特案真是这位美国总统和最高法院中的某些法官制造出来的,但后来透露出来的情况,又使这一事件呈现出另一个样子。在几年之后,属于最高法院法官麦克莱恩的一些记录被国会图书馆所收藏,使一些学者能够打开这一关键性案件的历史新篇章。

根据无可怀疑的证据,事情似乎是,当大多数法官最初决定废除这一伤脑筋的密苏里妥协案时,麦克莱恩法官向他们宣布自己 19 的主意,即把带有政治演说性质的关于维持国会废除准州奴隶制